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Language and Society

语言与社会

[第二版]

William Downe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Language and Society

语言与社会

[第二版]

William Downe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0-6937

This is a reprint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guage and Society (ISBN: 978052145663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is reprint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bo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所有。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如未获得两社书面同意，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社会：第2版 = Language and Society: 英文/ (英) 唐斯 (Downes, W.) 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8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①语… II. ①唐… III. ①社会语言学—教材—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827 号

出版人：蔡剑峰

责任编辑：杨书旗

封面设计：牛茜茜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http://www.fltrp.com>

印刷：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50×980 1/16

印张：33.5

版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010)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185290001

导读

◎ 徐大明

威廉·唐斯 (William Downes) 所著《语言与社会》(*Language and Society*) 是“剑桥语言学入门丛书”(Cambridge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s) 中的一本。这是一本社会语言学的教科书,也是一本面向非专业读者的社会语言学的入门书。该书曾被《语言》(*Language: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上的书评誉为“市场上现有的[社会语言学]^①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是对该专业最全面透彻的介绍”。我们手里这本书是该书的第二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2003年重印;该书第一版原来由伦敦的Fontana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第二版对上一版进行了修订,增补了许多内容,更新了许多分析。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 (William Labov) 对该书的评价是“可靠”和“清晰”,作为教科书和综述性介绍,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优点。

因此,要想了解“社会语言学是什么”,《语言与社会》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如果读者已经对该专业有所了解,阅读本书则可以获得一个更系统、更全面的视角,可以客观地比较不同学派的成果,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有关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作者并没有宣称创立了崭新的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理论,但是他对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地位的分析,还有他在本书中囊括的丰富的语言学成果,以及他对上述成果深入浅出的解说和独具匠心的整合,都体现出特殊的理论素养。然而,本书“点到为止”地停留在介绍和分析现有成果的层面上,尽管提供了一系列启示,但留下了进一步发挥和创建理论的空间。

本书分为11章:

一、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二、时间和空间的交织

① 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三、语言变体：过程和问题

四、发现变异的结构

五、卷舌音研究

六、社会因素的交叉点

七、变化、意义和认同行为

八、社会生活的论说

九、交流：词语与世界

十、行动和批评

十一、语言和社会解释

作者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为我们理解他的思路提供了最好的路线图。下面的各章导读也基本遵循原书的章节结构。

第一章“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指出社会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作者通过引用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 (Edward Sapir) 开篇, 指出语言在人类行为中不可分离的作用, 进而讨论“语言的本质”问题。然后, 他引入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 并与语言学界流行的其他观点进行了比较。在此, 作者结合英语中的几个语音变异的例子解说了“普遍语法”、“句法”、“语义”、“变异”、“社会意义”等概念。然后, 他给出了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宽泛的定义”: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专门研究语言所包含的社会特性, 结合社会环境因素作出关于语言的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解释。随后, 作者介绍了以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为代表的当代语言学理论, 包括下列概念: “语言知识”、“语言能力”、“语言模块”、“生物基础”、“认知基础”和“语言表现”等。在此基础上, 作者建立了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学理论的联系, 指出了社会语言学的实证特征。

与许多社会语言学著作不同的是, 本书不但建立了抽象的语言学理论和“话语”、“表现”和“变异”之间的关系, 而且进一步联系到“言语行为”、“城市方言”、“批评分析”、“语用学”、“会话分析”、“交际目的”和“社会符号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因此, 在作为绪论的第一章中, 作者初步展示了他广阔的语言学视野。

在第二章“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中, 作者开始深入讨论语言的本质和特性。内容涉及“语言类型”、“方言连续体”、“语言多样性”、“交际网络”、“语言变化”、“社会空间”、“社会方言”、“界面”、“接触”、“语言诞生”、“语言消亡”、“语言转用”、“皮钦语”、“克里奥耳语”、“标准化”和“全球化”等。其中, 语言“标准化”是修订版增加的新内容之一。而且, 作者结合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形势分析了世

界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扩散和语言冲突以及语言规划的作用。

第三章“语言变体：过程和问题”从对加拿大的语言冲突和语言规划的宏观分析开始，回顾了历史，讨论了当前的问题，进而解释了一系列双语现象。这是一个独特的介绍双语研究成果的方法，是认识微观和宏观双语现象之间联系的一个新途径。作者介绍的概念包括“双言制”和“语码转换”等复杂内容，但他从双语社会的宏观层面切入，逐步深入；这样既便于理解，又确立了不同层次的双语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此外，作者还将个案分析与理论综合相结合，并且在双语研究中巧妙地融入了语言规划的内容。现代社会无法避免语言接触和语言冲突，现代语言也必然包含语言规划的内容，这些都体现在当代的语言实际之中。但是，一些语言学家为了理论的目的，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将这些内容分离开。然而，本书作者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以个别带一般，以宏观带微观，以分析带理论，给读者一个生动具体的演示，加之贯穿其中的理论总结，可谓别开生面。

第四章“发现变异的结构”全面介绍了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从变异研究的渊源开始，作者一步步地阐释了有关成果和理论内容。尽管语言变异研究目前已积累了十分复杂的理论内容，作者仍然能够忠实可靠地把学界最主要的共识在本章中作系统的介绍和解说。

对无所不在的语言变异现象，学界曾经无可奈何地称之为“自由变异”和“方言混杂”而试图回避；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根据拉波夫的研究，“语言变项”作为语言变异的单位，是语言结构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语言结构”明确地体现了语言与社会相互联结这一基本事实。这些内容，作者在本章中有条不紊地用英语的(-ing)变项和拉波夫(Labov, 1966)在纽约发现的该变项的社会分布模式依次作出说明。然而，作者在此又有条不紊地引入了变异研究的方法介绍，同时又介绍了“言语语体”、“层化”、“土语”、“观察者悖论”等概念。在此，我们不得不再度敬佩作者深入浅出和分析综合的能力。因为，作者随即又引入了“规范压力”、“社区语法”、“能力语法”、“索绪尔悖论”等比较抽象的内容，不露痕迹地与上文顺畅地连接在一起。

结合“社会阶层”、“社会网络”、“直接群体”等概念，作者将语言变异的解释与社会语言结构的解释衔接起来，整个讨论浑然一体。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罢手，在综合评介社会语言学上述成果的基础上，他试图引入一个新的视角——“动态范式”的视角。不容置疑的是，这一理论升华仍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作者没有忘记其介绍和综述的宗旨，“动态范式”的介绍是以综合语言变化的“波浪理

论”、语言变异的“蕴涵层次”和语言变体所体现出的“泛方言格局”等内容的方式出现的。即便读者可不追随“动态范式”，仅领略作者对上述内容的综述也受益匪浅。

也许作者感觉第四章结束时有较多的理论导向，所以在第五章及时地转向了经验层次。第五章“卷舌音研究”对英语“元音后 (-r)”发音作了透彻的分析，透过一系列有关研究的介绍，不仅厘清了这一语音变异现象的来龙去脉，而且具体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变异与变化的运动机制。作者首先指出 (-r) 变项的历史根源，有关变式的发音机制，该变项在英国英语中的地域分布及其历史变化，进而分析这些变化对音系结构系统的影响。有关词汇的非卷舌变式的发音大约于18世纪在英国扩散开来，成为“标准英语” (RP, Received Pronunciation) 的一个特点。该发音怎样传播到美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在美国的传播途径似乎比较清楚，基本是从东北部逐步扩散开来的。有趣的是，作为一项语言变化，非卷舌发音在美国的扩散从20世纪中叶即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逆转。拉波夫 (Labov, 1966) 在纽约市所发现的 (-r) 变项的社会分布情况所反映的实际是在非卷舌发音已经扩散的地域的卷舌发音的再度扩散的趋势。在此，作者介绍了拉波夫 (Labov, 1966) 的百货公司调查，解释了“威望”的作用，并引入了关于黑人和白人社区的讨论。

本章介绍的其他新概念包括“穿越”、“矫枉过正”、“语音意向”等，基本没有涉及更抽象的理论层次。但是，如果说社区层次的分析是比较抽象的内容，关于黑人和白人社区的讨论可算例外。

通过综合一系列在不同社区调查 (-r) 变项的研究 (Bailey & Maynor (1989) 在得克萨斯州的调查、Levine & Crockett (1966) 和Anshen (1975)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调查、Wolfram (1969) 在底特律的调查、Myhill (1988) 在费城的调查等，自然还有上述拉波夫在纽约的调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同的社区有不尽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全国范围看，美国黑人社区在卷舌音扩散方面目前开始与白人社区趋同。

第六章“社会因素的交叉点”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时空观。本章把一系列理论内容与社区调查的结果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介绍。这一介绍包括下列内容：首先，语言形式的“空间扩散”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还包含社会空间，不仅有“邻里效应”，还有“中心地点”之间的跳跃式扩散。随后，社会空间中的语言变化可以继续区分——变化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上面的压力”，也可能是“来自下面的压力”。通过对特鲁及尔 (Trudgill, 1974) 和拉波夫 (Labov, 1966, 1972) 的经典研究的介绍，作者解释了“隐性威望”、“指示项”、“标记项”、“语言不安全感”

等概念。然后,作者介绍了米尔罗伊(Milroy, 1987)在贝尔法斯特的社区调查结果。在此,作者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关于“性别”和“年龄”的分析。最后,通过对“种族”作为一个社会因素的分析,作者导入了他的关于“黑人英语土语”的讨论。美国黑人英语可以认为是一个以种族为界限的英语方言,它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有与其他英语方言不同的特色。

第六章的总结小节被冠以“冲突、社会阶级和社会网络”的题目。在此,作者对以拉波夫(Labov, 1972, 1994)为代表的言语社区研究传统和以米尔罗伊(Milroy, 1987)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研究传统进行了综合,将前者限定为“地位导向模型”,后者限定为“团结导向模型”。为通俗起见,作者又将其分别称作“阶级模型”和“网络模型”。根据作者的观察,“地位导向模型”一般与“阶级”、“地位”、“规范的一致性”、“标准语”以及“中产阶级上层”联系在一起;而“团结导向模型”一般与“网络”、“团结”、“强制规范”、“土语”、“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因此,两种模型面对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层面,侧重描写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在此,作者指出,米尔罗伊夫妇(Milroy & Milroy, 1993)通过“网络强度”把社会网络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一般具有“强社会网”,而中产阶级则多为“弱社会网”。

第七章“变化、意义和认同行为”从讨论语言变化开始,进而透视语言变化的社会评价,然后通过语言态度与语言行为的联系概括出“话语是认同行为”的结论。学界曾经流传社会语言学缺乏理论的说法,读了本书之后你会觉得该说法没有足够的根据。而且,读了本书之后你会觉得众多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笔者更是佩服作者将许多不同的理论明确地联系起来的能力。本章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章,分18小节:变异与变化、真实时间与显象时间、马岛央化研究、嵌入与评价、变项的主观评价、语音变化的阶段、基本异质体、有序分化、启动:在哪里和为什么、规范和规范的改变、语言态度:配对语装、纽约市的主观评价、社会成见、权势与团结、个人与变异、“跛子”、言语适应理论、认同行为。下面分别介绍。

“变异与变化”一节主要介绍了变异学派的语言变化理论,在扼要地总结了历史语言学的成果之后,集中讨论了魏因赖希(Weinreich et al., 1968)提出的“过渡”、“嵌入”、“评价”和“启动”问题,为下面的讨论列出了框架。

“真实时间与显象时间”解释了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化的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通过对比同一个言语社区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重复调查,另一个是在同一次调查中对连续几个年龄组的讲话人的语言表现进行比较。后者的依据是:讲话人早

年习得的土语发音由于植根于人体神经和肌肉的运动机制中,难以改变;所以这些发音具有稳定性的特征。所以,目前四十来岁的人的口音很可能代表二十年前二十来岁的人的口音,六十来岁的人的口音代表四十年前二十来岁的人的口音,以此类推。如果连续几个年龄组在变式选用比例上表现出趋势性的递增(或递减)的变化,我们可以提出相应的语言变化的假设。

“马岛央化研究”是拉波夫(Labov, 1963)最早发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作者在这里介绍这项研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是“显象时间”研究的经典案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它是历史语言学导向的方言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案例。该项研究在解释了历史和地域音变的同时,提出了语言变化需要社会动力的观点。没有关于社会动力的分析,就无法全面解释在马岛发现的英语央化现象。

“嵌入与评价”继续分析马岛央化现象,指出该变化怎样嵌入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央化因而怎样获得了社会意义。央化发音由于是大范围历史音变在马岛的残留形式,结果被部分马岛居民认作是马岛传统文化的象征,然后在维护马岛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潮推动下传播开来。因此,不仅客观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了语言的形式,社区和群体的态度也成为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

“变项的主观评价”提供了对央化变项的主观评价的作用指标。马岛人对央化有三种态度:肯定、否定和中立。拉波夫把65位调查对象按照上述态度分作三组,发现他们的央化指标与态度紧密相关,(ay)变项和(aw)变项的指标都是肯定组最高,否定组最低,中立组介乎两者之间。

“语音变化的阶段”介绍了拉波夫(Labov, 1972)提出的语言变化的八个阶段:1)变化之前;2)规则初现;3)群体内扩散;4)代际变化;5)群体间扩散;6)语言系统内部压力;7)循环;8)来自上面的压力。其中,阶段2至阶段7是处于社会意识之下,只有到了第8阶段,才与显性威望、隐性威望联系起来,或者被“污名化”。

“基本异质体”指语言的常规变异状态。这种状态之所以被确定为变化之前的状态,是因为变异的形式比较随机,没有集中到能明确区分的两三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般认为是“固有的变异”所包含的两个变式的变项也应该是变化的早期阶段,只不过是停留在该阶段不再进展的变化而已。

“有序分化”指变异开始有了方向,讲话人之间传递的各种变异形式开始有了某种频率上的倾向性。这时,就可以说,变化被“启动”。

“启动:在哪里和为什么”回答某一项变化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而不在其他的时间、地点发生的问题。因为随机变异是常规,为什么此时此刻就不

再随机了呢? 在此, 作者比较了拉波夫 (Labov, 1980) 和米尔罗伊夫妇 (Milroy & Milroy, 1985, 1993) 所提供的不尽相同的答案。拉波夫认为变化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讲话人在认同方面产生了压力, 在此压力的驱动下产生了使用特定变式的倾向性。例如, 认同马岛文化的人倾向使用马岛口音。在这一点上, 拉波夫似乎没有受到质疑。受到质疑的是随即产生的“谁是变化的领头人”的问题。拉波夫根据社区调查的结果发现社区结构的中部是变化进展最快的部分, 因此他认为, 社区内联络范围最广的人是变化的领头人。米尔罗伊夫妇对此提出异议, 指出在内部联络最多的人往往是维护内部规范的人, 他们不太可能首先接受外部规范。他们的解释是: 中产阶级外部联络较多, 但内部联系相对不紧密。变化一般是通过中产阶级的弱网络关系来传播的; 内部联络密切的那些人, 即“强社会网”的核心人物的语言不易产生变化。按照本书作者的说法,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 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整合: 新形式一般是通过“弱社会网”传入群体, 但不是立即由群体的中心散播到群体的其他部分; 具有弱社会网的人一般处在群体边缘, 他们往往是新变式的导入者或创造者, 而一旦这些新变式传到中心并为中心所接受, 整个群体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规范和规范的改变”讨论语言规范的性质。语言变化主要是语言规范的改变; 而“规范”的本义是“行为的准则”, 因此语言规范的改变就是语言行为准则的改变。在此, 作者指出人类社会行为遵循一定准则的必要性。因此人们本能地将自己的行为规则化, 并“投射”和“聚焦”到社会层次 (LePage, 1980)。然而, 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会形成新的“投射”和新的“聚焦”, 也就是新的规范的形成。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都是造成包括语言规范在内的社会规范发生改变的原因。

“语言态度: 配对语装”一节中, 作者从马岛的语言态度说起, 然后从一般的语言态度, 谈到研究语言态度的工具——“配对语装”。“配对语装”是人们对一种社会心理学实验的叫法。该实验最初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兰伯特设计 (Lambert, 1967), 目的是确定人们对特定语言或特定语言形式的态度, 从而将其与针对特定讲话人的态度剥离。当人们见到某个讲话人之后, 就很难区分对这个人的态度和对他的语言和言语的态度了。在仅仅听到说话的录音之后, 虽然不能受到视觉印象的影响, 但通过声音特征或讲话内容等也可能产生很多联想。怎样才能控制讲话人这个条件来测试人们的语言态度呢? 典型的“配对语装”实验是找到一个或几个两种语言都说得流利的双语人, 然后让他们用不同的语言来讲一段意思相同的话, 然后将这些话的录音放给不知情的被试听。被试被要求判断这些“不

同的讲话人”，实际上其中包括穿着不同“语装”的同一个人。一旦着不同语装的同一个人讲话人受到不同的判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判断所反映出来的态度不是针对那个讲话人的，而是针对他的特定语装所代表的特定语言的。这个实验至今已经为世界各地的学者应用过成千上万次，一般总是可以得到有用的结果。

“纽约市的主观评价”介绍了拉波夫 (Labov, 1966) 在纽约做的类似的实验。拉波夫设计的语装不是不同的语言或不同的方言，而是同时在纽约流行的卷舌和非卷舌的发音特征，也就是 (-r) 变项的两个不同变式。同样一段英语话语，同一个讲话人录了三次音，一次是其中的可能卷舌的词全部发成带卷舌的发音，另一次是其中可能卷舌的词一个也没有发出卷舌音，还有一次是一部分卷舌一部分没卷舌的变异状态。实际操作的时候是一批讲话人都这样录了三次音，然后将这些录音以随机组合的顺序放给大家听，这样就更容易听出其中有相同的人。然后拉波夫让他的被试判断这些人（实际上是语装）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给出了一些选择，包括不同社会威望的职业中的典型职位，如“经理”、“经理秘书”、“前台接待员”、“清洁工”，等等。人数众多的被试都是纽约本地人，他们的判断惊人地一致，他们都是将卷舌音和部分卷舌音的语装判定为有较高社会威望的职业人士。拉波夫认为，这种根据语言特征来评估讲话人的社会背景的能力是讲话人的“交际能力”的一部分。

“社会成见”进一步介绍拉波夫 (Labov, 1966) 的实验，指出语言态度的复杂内容。对语装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内容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拉波夫还让他的被试判断作为语装的“个人”成为自己的朋友的可能性，以及他在街头争斗中取胜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兰伯特 (Lambert, 1967) 最初的设计中，对语装的评价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关于个人竞争能力的（智力、雄心、自信、勇气等），也有关于人品的（可靠、真诚、善良、热心等），还有关于社会吸引力的（可亲、可爱、幽默、善交际等）。包括拉波夫的实验结果在内的众多研究结果显示，并不是所有的人对特定语装的各方面的评价都是一致的。有的被试虽然认为某特定语装更有社会竞争力或更有地位，却不一定愿意跟他做朋友，或认为他人品也好。有些被试虽然认为具有接近标准语口音的讲话人更有社会吸引力，但还是更愿意跟自己口音接近的人做朋友。

“权势与团结”继续讨论语言态度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但是引入一个新的条件——“语境”。在人际关系和言语互动中，权势或团结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讲话人之间可能是权势差异的关系也可能是地位等同的关系——但也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确定。如果讲话人面对的是一个强调社会地位差距的语境，那么他就会尽

可能地对代表权势的语言特征作出反应,例如,说话时努力向标准语靠拢,或给予标准语口音的讲话人较高的评价。如果讲话人面对的是一个以团结为目标的语境,那他更可能会向对话人的土语靠拢,或对双方共同的语言特征给予较高的评价,特别是当该特征与标准语不同的时候。

“个人与变异”讨论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一员,需要遵循起码的社会规范;但个人往往又同时归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语言规范又不尽相同。有时,个人受到几个不同方面的压力,那他的语言行为因此而可能变得既不属于这个群体的典型又不属于那个群体的典型,而有可能是不伦不类的,处于某种“中间”状态。

“跛子”讨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语言现象。拉波夫 (Labov, 1972) 在研究黑人青少年团伙的时候,发现了当地团伙中流行的“跛子”的说法。这一名称专门用来指称那些处于团伙组织边缘的成员,这些成员缺乏典型的团伙语言特征。随后的一系列研究都发现,不仅黑人青少年团伙如此,任何紧密组织的边缘成员都可能成为“跛子”。概括地说,与组织联系的紧密程度总是与成员的语言表现接近组织特有的语言规范的程度成正比。“跛子”是对特定规范而言,有一定的相对性。与小范围群体的规范疏远,因此而有可能与大范围群体的规范更加接近。

“言语适应理论”(Giles, 1980, 1994)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理论,显然作者认为它是社会语言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理论包含两个重要内容,即“趋同”和“趋异”,它们描写言语交际中的两种取向:前者指尽量接近对话人的语言,后者指尽量扩大与对话人在语言特征上的差距。这个理论之所以重要,作者认为它说明了语言行为是认同行为。讲话人“趋同”时是认同对话人的群体,“趋异”则表示不认同该群体。

“认同行为”一节介绍了“认同行为”理论 (LePage, 1980)。根据该理论,讲话人在每次发出一段话语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表示他是在何种程度上认同言语社区中的某某群体。有时讲话人创造出一个介乎两个或几个群体之间的某个特殊的位置,但反映的还是对这些群体的不同程度的认同。作者在此对该理论有所发展,他指出:社区中无数的个人的无数的认同行为最终构成了在社区层次上体现出来的结构特征,这些实际上就是社区规范,而这些规范使得言语活动产生意义。

第八章“社会生活的论说”开始讨论“较高层次”的社会语言学模式;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语音、语法、词汇的变异现象及相关的社会因素的解释,而进入日常生活中人们怎样用语言“做事情”的讨论。从上文看,我们可以得到“语言的应用是社会行为”的观点,但是,这里讨论的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使用不仅仅是理论上

的解释,或者是讲话人没有自觉意识的社会行为,而是那些讲话人有比较明确目的的、有意识的语言交际行为,因此,是“显而易见”的社会行为。

首先,语言的使用是人类“有规则的活动”。如上文所述,规则性保障了这些活动的“有意义性”。其次,言语活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项合作性活动。会话人相互配合,才能产生有效的言语交流。此外,会话本身是有结构的,这些结构也体现了言语活动的规则性。在此,作者介绍了关于会话结构 (Schegloff, 1968) 的研究。

谢格洛夫 (Schegloff, 1968) 研究了人们怎样开始一次会话,该项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会话的程序是,首先需要有一个“开始”的部分。通过研究电话会话,谢格洛夫发现,“开始”的起始部分是电话的铃声,因此他认为,会话的开始不一定就从话语开始。日常生活中,听到电话铃声,人们一般会接电话,而接电话有一定的社会规范,除了拿起听筒听之外,还要有言语反应,如讲汉语的人会说“喂”,讲英语的人会说hello,等等。电话铃响和接电话这两个连续的动作共同构成一次电话会话的“开始”。因为二者紧密连接,所以谢格洛夫称之为“紧接语对”。会话中的“紧接语对”有很多种,而构成会话开始的紧接语对是“呼叫-应答”语对。有了这个语对,会话即告开始。但是如果该语对不完整,则不能认为会话已经开始。例如,只有“呼叫”而没有“应答”,或者“应答”不规范的情况(接电话的人拿起听筒但不说话)。

除了“呼叫-应答”语对,会话中常见的紧接语对还有“问题-回答”语对、“问候-问候”语对、“感谢-回应”语对、“道歉-接受”语对、“提请-接受/谢绝”语对,等等。其中,“问题-回答”语对在会话中往往反复出现,相比之下,“问候-问候”语对在一次会话中一般不会重复出现。如果一个语对不完整,可以理解为“正式缺席”。例如“问候-问候”语对,当我们问候某人的时候,对方没有回答我们的问候。这时我们必然就会给这种“缺席”找一个原因:对方没听到?不愿意回答?想回答但不能回答?不原意回答是因为什么?不能回答又是因为什么?等等。总之,如果语对是完整的,我们一般不会多想,只当是“理所当然”。

关于“会话分析”,作者在本章中还详细介绍了对于“恭维”的回答的分析,还就“礼貌”、“话轮”、会话的“结束”等内容展开讨论。

本章中其他主要内容包括“交际民族志学”的“言语事件”的研究和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体系等,且都辅以详细的案例解说。

第九章“交流:词语与世界”讨论言语交流中意义是怎样传达的。其中,重点介绍了“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95)。作者从语义学的局限性谈起,指出话语的字面意思不足以传达“讲话人语义”;交流中人们依据语境和背景信息来获

取语境语义。在言语交流中人们的话语所传递的实际上不是其词典意义,而是生活中的百科意义,而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一种提示,要想准确地理解话语的意义还需要结合说话时的具体环境,并需要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与此相关的概念有“相互知识”、“相互明示”、“桥接推断”、“语境含义”、“交际意向”、“信息意向”、“关联原则”等,本章都一一进行了介绍。

第十章“行动和批评”从讨论“行动和意图”开始,首先介绍了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区分了“发话言行”和“示意言行”,前者只是言语表现,而后者是“以言行事”。而且,该理论进一步将“取效言行”区分开来,因为它是“以言成事”。示意言行包括,如作者所举的例子所示,“陈述”和“控诉”等。取效言行则包括恐吓、取笑、同情等。在解释了上述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后,作者进一步介绍了言语行为的“适宜条件”(Searle, 1979)和会话的“合作原则”(Grice, 1975),牵涉到的概念有“真诚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示意点”、“会话含义”等。然后,作者结合“话语分析”的介绍提出了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在此,作者首先列出莱文森(Levinson, 1981)的观点:言语行为与句子类型并非一一对应;然后列出施佩贝尔等人(Sperber & Wilson, 1995)的观点:有些言语行为是需要明确显示意图的,有些言语行为则是不需要明确显示其用意的。然后,作者提出了“强含义和弱含义”连续体的模型,指出听话人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判断,从比较肯定的关于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判断,到比较难以确认是否是说话人意向的话语的间接信息的判断。在此,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语用学理论和“话语批评”理论的作用,指出前者偏重表面内容的分析,后者偏重深层社会历史内容的分析。普遍性的、进入一般性文化层次的言语交际的规则是重要的语言事实,对这些事实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进一步开展深层分析的基础。然而,我们发现,现实的言语交际是变幻多样的,不但个别讲话人会灵活运用一般的会话原理以达到间接的目的,社会机构也以此作为一种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第十一章“语言和社会解释”全面总结了全书的内容,并试图将其整合到作者关于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的分析中去。在这一点上,作者超越了大部分语言学教科书,他不仅展现出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视角,而且上升了一个层次,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有关理论解释的性质。首先,作者紧扣语言学的传统主题——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社会语言学,他将其上升到语言表现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回顾了社会语言学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种种成果。这些成果说明,不联系社会因素,语言的传情达意功能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随后,作者进入主题——书中重点介绍的各种理论,例如变异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解释。在

此,作者作出了初步区分,语言变异的实证研究是属于类似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论解释,而语用研究应用的是哲学家提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作者认为,二者是可以结合而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的语言学理论的。

作者认为,虽然变异理论在描写语言变异的社会模式时是无可替代的,但这些变异模式也是可以用讲话人的目的和他们的语言行为来解释的。变异的社会模式是对集体行为及其功能的解释;而个别讲话人的目的是对由无数个人行为最终所形成的社会模式的解释。之所以出现社会群体之间在语言表现上的有规律的差异,是因为每个讲话人都有语言认同的意识和实现其意图的语用策略。在言语活动中,他们利用这些语用策略,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语言表现以达到认同的目的,以至形成了其变异指标与社会认同高度相关的结果。

总体上看,本书迄今仍然是对社会语言学所作的一次最全面的介绍,也是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语言学理论进行整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自从本书出版以后,社会语言学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例如,中国学者提出和开展了“言语社区理论”

(徐大明, 2004, Xu, 2006等)的研究,中国和欧洲学者合作开展了“城市语言调查”(徐大明、王玲, 2010, Berg & Xu, to appear等),欧美学者新近提出了“语言是复杂适应系统”(Steels, 2000, The Five Graces Group, 2009等)的观点,等等。但是,这些新的发展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言语社区理论的基础包括语言变异研究、历史语言学、语言社会学、双语学、语言规划研究、语言哲学等;城市语言调查的主要基础是传统方言学、城市方言学、克里奥耳语研究、交际民族志学、语码转换研究、话语分析等;“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语言变化研究、社会符号学、功能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成果之上。上述这些内容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介绍或中肯的批判。

总之,《语言与社会》不是一篇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流水账,也不是一个语言学学派的概览;而是在全面介绍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的综合批判,也是在综合评价基础上的理论整合。

参考文献

- Anshen, F. 1975. Varied objections to various variable rules. In R. W. Fasold & R. Shuy (eds.), *Analyzing Variation in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Colloquium on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Bailey, G. & Maynor, N. 1989. The divergence controversy. *American Speech*, 64.
- Berg, van den & Xu, D. to appear. *Industri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 Downes, W. 1998. *Language and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H. 1980. Accommodation theory: some new directions. In M. W. S. de Silva (ed.), *York Papers in Linguistics*, 9, Festschrift R. B. LePage. York: Department of Language, University of York.
- Giles, H. 1994. Accommodation in communication. In R. Ash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umes 1-12. Oxford: Pergamon Press.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ume 3, Speech Acts*. London: Academic Press.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 1980. The social origins of sound change. In W. Labov (ed.),

- Locating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 London: Academic Press.
- Labov, W.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Lambert, W. 1967. A social psychology of bilingualism. In J. Pride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LePage, R. B. 1980. Projection, focussing, diffusion. In M. W. S. DeSilva (ed.), *York Papers in Linguistics*, 9, Festschrift R. B. LePage. York: Department of Language, University of York.
- Levine, L. & Crockett, H. 1966. Speech variations in a Piedmont community. In S. Lieberman (ed.), *Explor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Levinson, S. 1981. The essential inadequacies of speech act models of dialogue. In H. Parret, M. Sbisà & J. Verschueren (ed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Pragma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 Milroy, J. & Milroy, L. 1985.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network and speaker innov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 Milroy, J. & Milroy, L. 199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urban dialects: the role of class, social network and ge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
- Milroy, L. 1987.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secon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yhill, J. 1988. Postvocalic /r/ as an index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BEV speech community. *American Speech*, 63.
- Schegloff, E. 1968. Sequencing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 In J. Gumperz &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earle, J.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 & Wilson, D. 1995. *Relevance*. Oxford: Blackwell.
- Steels, L. 2000. 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In M. Schoenauer